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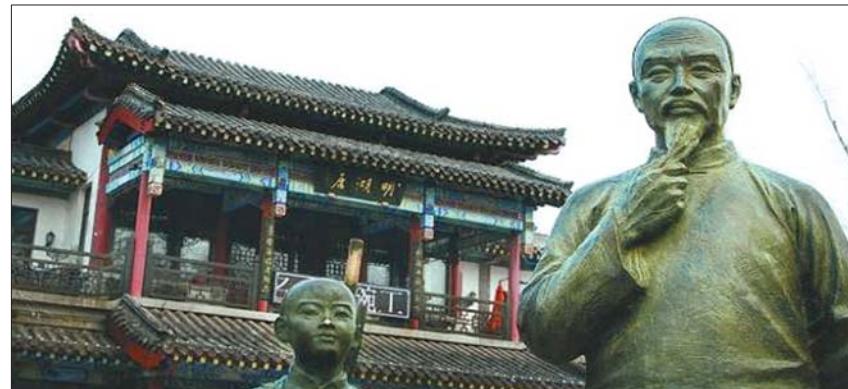
济南人爱曲艺,也盛产曲艺名家。“曲山艺海”一词总是带给人们无限遐想,仿佛济南戏曲、曲艺曾经真的极度繁盛、登峰造极,然而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。在近代济南,铺天盖地的是大鼓、琴书、相声、评书以及地方“小戏”,它们都是以“说唱”为基本表现形式。相比之下,戏剧在近代济南的发展乏善可陈。相对于地方小戏,济南人习惯将京剧等戏剧形式称为“大戏”,既要有“说唱”,又要配合身段、场面等“表演”形式。所以说,“曲山艺海”这个词所指的是以“说唱”为主的各种曲艺形式,而非指戏曲。

“曲艺”一词在清代是指演艺类的小技能,民国时期则成为“杂耍”一词的别称,不仅指说唱艺术,还包括了杂技、戏法。1953年9月,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“中国曲艺研究会”,“曲艺”这个词才成了说唱艺术的专用名称。这以后,“曲山艺海”这个词才流行起来。

济南的曲艺演出活动萌发于清朝末年,之后演艺市场逐渐活跃,曲艺也慢慢在济南开枝散叶,聚山汇海。曲艺的发展也和济南开商埠、逐步近代化的历史吻合。20世纪初,胶济铁路通车、开设商埠以后,济南逐渐成为“水陆码头”,城市人口激增。济南由一个封闭、保守的政治型城市变为一个开放、商业资本涌入的商业型城市。活跃的经济刺激了人们对娱乐的需求,城市人口的增多储备了大量的潜在受众。另一方面,津浦铁路通车后,运河沿岸的经济迅速衰退,加之军阀混战、灾荒连年,大批原先在运河流域如济宁、临清等地活动及农村谋生的艺人陆续进入济南,为济南提供了大量的演艺人。这是济南近代经济环境因素对“曲山艺海”形成的影响,济南曲艺繁荣的序幕由此拉开。

济南独特的人文环境对“曲山艺海”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近代,许多地方小戏进入北京、天津等大城市发展,逐渐演变为“大戏”。与北京、天津等大城市不同,长久以来,济南民风淳朴,所流行的剧种都夹带着一股“土气”。所以许多民间小戏、俚曲等曲艺形式,反而在济南独特的文化环境中如鱼得水,迅速发展起来。如山东琴书、河南坠子、西河大鼓、木板大鼓、山东快书这些由农村进入到城市的曲艺形式,在济南这样一座规模颇大的城市中发展迅猛,颇受欢迎。

这一时期的济南曲艺以山东大鼓影响最大,一时名家辈出,风靡泉城。清同治十年(1871)秋,山东大鼓女艺人郭大妮至济南演出,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个进入大城市行艺的山东大鼓艺人。之后,又有来自临清的女艺人黄大妮来济南西关演唱。光绪十年(1884)前后,黄大妮的表妹王小玉姐妹来济,在明湖居、趵突泉四面亭演唱。王小玉姐妹就是《老残游记》里提到的白妞、黑妞的原型。



▲济南素有“曲山艺海”的美誉,作为演出场所明湖居功不可没。

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## 济南曲山艺海的盛与衰

□耿全

民国时期的济南曲坛,南词北曲荟萃、名家大师云集,茶园、茶棚、书场鳞次栉比。据资料记载,1921年左右,仅新市场内就有戏院剧场4处,茶园、茶社、茶棚20余家。这些书茶馆中,天天上演着数十个曲种,热闹非凡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,在济南能见到洋琴、河间大鼓、木板大鼓、河南坠子、评词、相声、双簧等多种曲种形式,常年演出于趵突泉、南岗子(新市场)、西市场、劝业场、大明湖等处的茶园、书场以及庙会和堂会。据1932年统计资料,济南市区有曲艺场所39处,艺员240人,其中,女艺人就占了三分之一。

倪锡英在1936年出版的《济南》一书中曾写道:“在济南城区一带,民间最普遍的娱乐,便是听大鼓书,因此在热闹的大街上随处都有大鼓书场。市民在工作之暇,便去听书。那些唱书的全都是年轻女子,听书的一边喝着香茗,听那鼓词高亢的音调在耳边转,是很够味儿的一件乐事。”

济南与北京、天津过去同为曲艺三大码头,相声行里有一句话:“北京学艺,天津练活,济南踢门槛。”一般的解释是说济南观众要求高,在北京成名了才敢在济南演出,这种说法并不对。过去,济南的曲艺观众要求低、包容性高,不像北京、天津的观众那么挑剔,刚刚

出徒的相声艺人在济南很容易吃上饭,这一点对于其他的曲艺形式也一样适用。市场大、门槛低,近代济南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对等,造成了曲艺在近代济南独秀一枝,形成了“曲山艺海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在政府扶植下,说唱艺人以个体形式陆续恢复演出,全市有曲艺场所24处,艺人105名。到1966年,市区有曲艺团8个,其中国营的有济南市曲艺团、山东省曲艺团,民间职业团体有明湖曲艺队、历下区曲艺队、市中区曲艺队、天桥区曲艺队、槐荫区曲剧团、晨光茶社相声曲艺队,演职人员达260人。曲种有山东大鼓、山东琴书、山东快书、西河大鼓、乐亭大鼓、京韵大鼓、梅花大鼓、河南坠子、竹板书、数来宝、单弦、相声、评书等,济南曲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演出水平和繁荣的演出场次。“文革”期间,各曲艺团体被迫解散,济南曲艺界仅有唱河南坠子的郭文秋和一名琴师。济南“曲山艺海”的好时光就此结束,存续时间只有五十余年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恢复了市曲艺团,新建大观曲艺厅,但业务骨干多为中青年演员。这一时期,广播、电视渐成主流,以撂地、小茶馆为表演形式的曲艺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。上世纪80年代,济南的曲艺还有一定实力和影响,但国家对曲艺的扶持多集中在北京、天津,济南的曲艺界被边缘化,曲艺表演人才出现断层。

如今,济南曲艺种类单一,名家寥无几,曲艺观众寥寥,缺乏专业的曲艺演出场所。若想再现“曲山艺海”,必须丰富曲艺种类,提高表演水平。抛弃旧日虚名和行业陋习,从曲艺的特点入手,提高演员水平、培养青年观众、营建曲艺氛围。同时,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同时,注重曲艺的发展和转型。

重现“曲山艺海”的盛况只能从零开始。但从零开始未必是坏事,轻装上阵反而跑得更快。艺人同观众互相扶持,一同成长起来,那才是真正的“曲山艺海”吧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## 针线活里有能人

□黄杏林

自古以来,女孩子大多从小就要学做女红(所谓“女红”是纺织、缝纫、刺绣、剪花、染色等技艺的综合说法),虽然五四运动后的一些新女性,没有循这个规矩,但在上世纪,做针线活,仍是家庭主妇的一项基本功。尤其是在那贫穷落后的年代,虽有成衣铺,也有服装店,可大多数人家买不起成衣,更进不起服装店量身定做。一家老小,从头到脚,所有穿戴,还是全靠自家手工裁剪缝制,连破补烂。这也造就了不少做针线活的里手、高手、巧手。

小时候,我家的针线活都是姑姑或婶子们给做。她们一个个都做得一手好活,各种针法,无所不能,大活小活,无所不会。我是她们最铁的观赏者和崇拜者,我看她们做衣服,就像看魔术师变戏法,也像看工艺师制作艺术品一般。眼见,一整块棉布,在她们手中,上下一量,三折两划,一会儿就剪出个上衣的半成品,然后,飞针走线,合身、缭边儿、上领子、锁扣眼、钉纽扣,不到一天的时间,一件合身的褂子就完成了。她们把针线活做得那个娴熟、麻利、平整、细发,真让人为之叫好,赞赏不已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她们出手的每件活,都做工精良,功夫过硬。针线活里,无论是绷、引、拱、缭,还是煞、签、缉、锁等各种针法,她们操作起来,都得心应手,针针规范。所有缝针之处,正看反看,针距都一般长,针脚都一般大,走线都一般直。尤其是看她们缉的鞋口,就和缝纫机缝的一样。这要没有严格扎实的童子功底,没有潜心求美的良好素养,没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,绝做不出这般精品。

我的姑姑和婶婶们,个个心灵手巧,在服装样式上,从不因循守旧。解放后,她们只要看到流行的新款式,琢磨琢磨,接着就能复制出来。什么列宁服、连衣裙、人民装等等,她们都能做得像模像样。不光缝制新衣,做工精细,一丝不苟,就是打个补丁、补双袜子、做副棉手套,那活做得也都无可挑剔,甚至十分精巧。记得她们给我膝盖和胳膊肘处补的补丁,有长方的,有椭圆的。凡长方的,四个角都能精准到90度。凡椭圆的,上下的弧形,就像圆规画出来的。确切说,那不叫补丁,倒像是装饰图形,谁见了都啧啧称赞。姑姑拿袜板给我们补的袜子,上、下底布,都是密密地纳了的,袜面的前头儿,总补成燕翅形,或花瓣形,后跟补上一个半圆,穿着不但跟脚耐磨,脱了鞋还十分好看。

每当姑姑她们完成一件产品,无论是全新的,还是补旧的,总兴致勃勃地让我们穿上试试。她们左看看,右瞧瞧,那表情,那神态,就像画师在欣赏自己的画作,作家在捧读自己的小说,诗人在吟诵自己的诗歌,得意而又欣喜。可惜的是,她们和过去许许多多做针线活能手一样,由于历史、社会或家庭的原因,大都没上过学,可她们的聪明才智,她们的素质能力,她们的审美情趣,都从针线活里彰显了出来。我常想,如果她们也受过学校教育,有了文化,就凭她们如此的心灵手巧,如此的追求完美,如此的不辞辛劳,说不定,她们也能在社会的某个领域,成为一位不让须眉的女强人。

我从小喜欢看姑辈们做活,既见证了她们高超的针线活技艺,也看明白了做各种活的路数,当时无机会实践。可到了我升任为家庭主妇的时候,正赶上物资匮乏的票证年代,我见习的针线活技术就派上了用场,有了用武之地。多少年来,一家人过年的新衣服全由我来制作,儿孙们从诞生到上学的棉衣也都由我亲手缝制。我做的活虽比不上姑辈们精致,但她们的针法和技巧,心气和品位,多少也潜移默化在我的作品里。从学会做针线活这事,我体会到技不压身的道理和乐趣。就是现在,我以为,学点针线活,掌握这门传统技艺,也有用,起码自己方便。至今我还保存着给小孙子做的一身新棉衣,不为别的,就为留个念想,不光回想起自己做活的不易,也怀念着我的师傅——姑姑婶婶们当年精心劳作的楷模形象。

## 济南日本守备队兵舍



影像老济南

□撰文/供图 陈强

照片中的建筑为上世纪20年代的“济南日本守备队”兵舍,大体位置在今济南火车站广场东南侧。

日本守备队建制起源于1905年。日俄战争后,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签订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《朴次茅斯和约》,规定:“两订约国可留置守备兵,保护满洲各自之铁路线路,至守备兵人数,每一公里不过十五名之数。”日本守备队最初是以保护南满铁路附属地周围的安全为名建立,在南满铁路沿线沈阳、抚顺、长春等城市均建有日本守备队,又称铁道守备队或护路守备队。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的导火索“柳条湖事件”,就是由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阴谋策划,由奉天独立守备队具体实施的。

济南的日本铁道守备队约成立于1914年-1915年。1914年一战爆发,日本对德国宣战,当年11月,驻守青岛的德军投降,胶济铁路全线被日军霸占,并在胶济铁路沿线大站设立铁道守备队。直到1922年,中日间签订《解决山东悬案条约》《山东悬案细目协定》《山东悬案细目铁路协定》等一系列条约,中国政府收回青岛,济南守备队也随之撤销。1929年,南京国民政府设立济南市,这里又成为济南市的办公驻地,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。